



歌德说,“音乐是流动的建筑,建筑是凝固的音乐”。如果说建筑是音乐的活,那么筑起传统建筑的砖瓦就是那跳动的音符。在江苏昆山市锦溪镇的中国古砖瓦博物馆,你会看见一片片、一块块古老、拙朴、厚重却不失美丽的砖瓦,如同一串串音符谱就了一首经典名曲。这悠扬之音从历史深处飘来,吟唱着人类文明史的更替与演进。

走进锦溪镇位于清代民居“丁宅”内的中国古砖瓦博物馆,各类古砖瓦珍品琳琅满目。馆内珍藏最早的一块砖距今已有5000余年历史,为良渚文化遗物。它由黏土、砻糠和稻草糅合夯实,并以竹竿和芦苇作骨架,经大火焚烧而成,考古界称之为“红烧土”,也就是砖之“元祖”。

钟爱古砖瓦的陆秋生馆长在“红烧土”面前的讲解颇有激情,“华夏先民以超然的智慧、勤劳的双手、惊人的气魄,为开创人类的住宅文明,进行着一场泥与火的革命。盘泥成坯,开窑烧砖,筑室造屋,解‘茅茨土阶’之弊,建邑辟居,聚异姓之国。劈开混沌,走出洪荒,迎着东方地平线上即将升起的轩辕文明”。

仅400平方米的古砖瓦博物馆内珍藏着2300余件展品,跨越华夏5000余年的文明史。从汉代城砖、六朝板瓦、西晋纪年砖、唐宋甬榫井砖,到明清、太平天国、民国时期,乃至以五星为标志的青砖应有尽有,堪称一部卷帙浩繁的砖瓦发展史长卷,每一件藏品都是闪烁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之光的艺术结晶。

我国是世界砖瓦的发祥地。在陆秋生眼里,这些远古遗留下来的砖瓦承载的是历史,记录了人类文明前进的足音。

## 听,古砖瓦在诉说

□ 李佳霖

馆藏瑰宝“铜雀瓦”是建安十八年曹操在河北临漳建造的金凤台、冰井台、铜雀台之遗器,筒瓦背面镌有“建安五年三月造”。当年的铜雀台早已被历史的风尘所湮没,这片筒瓦却历经1700多年,仍妥善地保存于江南小镇一隅,让观者的思绪忽地飞到波澜壮阔的三国时代……

一组宋元明清特色瓦当吸引了我的视线。这些瓦当涉及龙凤、花卉、鱼虫、松梅竹菊、石榴莲理、富贵牡丹诸多图案,或粗犷写意,或精细雕刻,品质之高,收藏之全,令人赞叹。宋元时期起,古砖瓦的装饰艺术从皇家宫廷惠泽到了民间,为古砖瓦艺术的文化传承创造了便利。从江南民居到苏州园林,从“徽商”到“晋商”豪门府第,乃至北京四合院,使用的古砖瓦雕饰无不构图新颖、刀功传神、工艺精湛。

陈列于博物馆正厅的一排“金砖”乃是铺设皇官地幔的方砖。据馆中资料介绍,金砖乃钦工物料,质量要求十分苛刻,只有色泽纯青,敲之铮然有声,且完好无损才算合格。“金砖”规格大、易于变形,成品率极低,一般10块砖坯中仅出1到2块成品。“金砖”的产地在苏州,加上昂贵的运输费用,因此历史上真有“一两黄金一块砖”的天价。

参观完砖瓦展品后,再看“丁宅”的砖雕门楼。这座始建于清顺治年间的江南深宅大院,本为一“丁”姓商贾的豪宅。古朴沧桑的老宅,把古砖瓦文化映衬得更加厚重悠远。

锦溪这座美丽的水乡小镇曾有过72座窑,制砖烧窑历史悠久。大量古砖古瓦散落民间,引起了一些收藏爱好者的浓厚兴趣。1996年春,为进一步挖掘华夏古国的砖瓦瑰宝、弘扬“古砖瓦文化”,由昆山市人民政府、锦溪镇人民政府共同筹资并正式创建了“中国古砖瓦博物馆”。目前,锦溪以千年历史文化为底蕴,以古镇、古桥、古河为依托,精心打造“中国民间博物馆之乡”,已经拥有中国古砖瓦博物馆、中国历代钱币珍藏馆、华夏天文馆、华夏奇石馆、华东第一古董馆等15家博物馆。这一特色,正吸引众多中外游客来古镇锦溪一日游。



在我们记忆深处,成功的地标性建筑总是能让人深度感知一个国家、一个地区、一座城市的文化内核、历史脉络、精神气质或经济实力。作为地标性建筑,有时承载起的意义超乎世人所想:为地域注入新活力,或是为世人传承文化与记忆……

### □ 美与丑的变奏

某网站评选出了2012年第三届中国“十大丑陋建筑”,状似“金元宝”的河北元宝塔、耗资巨大的成都新行政中心、世界最高人工瀑布大楼苏州东方瀑布大楼等建筑入围。

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选出的全球“最丑十大建筑”中,沈阳作为新地标的方圆大厦不幸位列其中。

仔细观察后发现,这些一开始就被当作地标来造的建筑造型独特,其中不乏名家设计,但却成了人们眼中的“最丑”。建筑丑在哪里?什么样的建筑才是人们心里的美丽地标呢?让我们看看那些获得普遍认可的中外城市地标:

当你漫步至埃及卢克索的古神庙遗址,游走于罗马的大小广场,抑或是纽约的中央公园,你都会发现一座座方尖碑。方尖碑传自古埃及,本是宗教的象征,随着时间流逝,各国都赋予了它新的意义:阿根廷为了庆祝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建立400周年设计的方尖碑,成了这座城市的第一象征;华盛顿纪念碑是一座大理石方尖碑,高169米,特区内任何建筑都不得超过它的高度……它们的意义更多地在于象征,或者纪念。

中国也有类似的地标性建筑——塔(楼)。古代的木质结构,决定了我国庭院文化的建筑特征,塔楼作为当时少有的高层建筑,成了古代传统意义上的地标。号称“天下第一楼”

的黄鹤楼,则是见证我国历史脉络,展现不同时代精神气质的标志性建筑。

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,建筑史上诞生了一个奇迹:建筑者仅用1年零45天便建成了102层、高达381米的帝国大厦,且质量优异,意外遭到一架美国陆军轰炸机撞击后竟然纹丝未动。不过,它的坚固却成为电影导演们的“戏”点:《金刚》中,那只巨大的猩猩爬上大厦顶端;在《西雅图夜未眠》中,它把浪漫发挥到了极致,成就了一场美好的爱情。

看来,真正有生命力的建筑,多是从一定的人文环境中生长出来的,因而才在历史长河中能够得以传承,继而成为地标。方尖碑如此,黄鹤楼如此,帝国大厦也如此。

反观我们的“最丑”建筑,“反人文”的内容比比皆是:河北的元宝塔是赤裸裸的“财富塔”,建筑造型似在宣示着金钱至上的观念;成都新行政中心则过于“奢侈”,据说单是建筑群的七分之一就卖了3.6亿元;苏州东方瀑布大楼是世界上最高的吉尼斯级人造水系景观,整个大楼由6个台阶式主瀑布和113米高的擎天玉柱顶楼组成,喷水高度超过138米,在推进节约型社会建设的今天,这种浪费水电的做法实在惹人反感。

对于建筑的评价,历来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有地域差异,也有时空差异。但总的来说,不能脱离当地历史、脱离人文环境,否则最终只能成为一处碍眼的存在。

### □ 迷失的城市风格

中国应该有专属于自己的、被世界所铭记的标志性建筑,这一点毋庸置疑。

鸟巢、水立方、国家大剧院的建成,无疑让外国人看到了中国的开放程度和我们的经济

实力。但与此同时,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步伐不断加快,不少城市也开始为争建地标建筑“风潮”推波助澜。

北边建了“大裤衩”,南边马上“小蛮腰”跟进;沈阳“铜钱大厦”被评为世界“最丑建筑”还没几天,抚顺耗资过亿元“大铁环”又跳出来抢眼;还有那北京望京“拉长”版的“中国馆”、杭州仿建的埃菲尔铁塔……这些造型“新颖”的建筑,设计也许出自哪个外国名家,身上也许有着某个名建筑的影子,单挑出来看也许都不错,但放在我们的城市,却不那么和谐。我们不禁要问,究竟哪里出了错?

“原因在于对自身‘式’的迷茫,以及对城市‘核’概念的缺失。”原建设部城市规划师、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理事长陈为邦说。

陈为邦举了个例子:在现代建筑进入日本的初期,日本建筑师们面对从天而降的外来文化一时束手无策,如何让现代建筑在日本生根成了最大命题。于是他们试探着在钢筋混凝土建筑上加上屋顶,称之为“帝冠样式”、“祥和折变”。这似乎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,但目的是好的,那就是要拥有“日本式”建筑。随着日本设计师们的不断尝试,他们重新审视日本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时发现,日本传统建筑空间的流动性、构造和表现的一致性、使用材料与自然融合等等,都与现代建筑不谋而合,这从根本上肯定了传统日本建筑的价值,也为现代日式建筑找到了出路。如今,他们的设计不再追求哗众取宠的形式,而是以全部的精力在实用的前提下阐述城市内涵,让居者爱其城。这代表了日本建筑关注日常、以人为本的传统,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同与推崇。

这个�故事告诉我们,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都有自身的特点与活力,这是建筑的“核”。只有坚持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,才能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,丰富和发展本土文化,从

而产生适应时代并专属于自己的“式”。

现在,我们不少城市在丧失自身特色的同时,却到处兴建“地标式”本土建筑,也许只能用社会心理的浮躁来解释这种现象。人们不介意眼前一亮,但如果到处都亮,那就成了炫光,最终导致对形式麻木、对城市厌恶。

中国建筑曾与欧洲建筑、伊斯兰建筑并称为“世界三大建筑体系”。相对而言,中国建筑历史更加悠久,体系更加完整。在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今天,热心于打造地标的人士,真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所在城市的“核”,思考一下这个城市的“式”,从而使落地的建筑真正被老百姓喜欢,且经得起历史考验。

### □ 亮出中国信心

中国近几年的新地标,从上海的浦东国际机场、东方艺术大剧院,到北京的央视大厦,再到广州体育馆、国际会展中心,以及广州电视观光塔、广州双子塔等,无一不是国外建筑设计师的作品。本土设计师真的这么不给力吗?其实未必。

在加拿大多伦多,有两栋近60层的曲线建筑,被当地媒体和居民昵称为“梦露大厦”。“模糊性”自由度及无多余死角的概念,让“她”成为整个安大略省的重要标志性建筑。这两栋让加拿大人自豪的地标,均出自中国新锐设计师马岩松之手。

其实,中国设计师正在快速成长着,越来越多的中国设计师开始亮相世界建筑舞台。他们当中不乏有创意、有才华、有想法的人,欠缺的是经过历练后的成熟。

49岁的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,此前在业界并没有太大名气。2005年宁波博物馆招标时,曾设计首都

博物馆的法国AREP公司和曾参与国家博物馆设计的德国GIP公司都来参加竞标,专家评审团最终被王澍“新乡土主义”的想法打动。

王澍拿最具宁波地域特色的瓦片墙作为博物馆外墙,用的老砖瓦都是宁波旧城改造中拆下来的废弃物,这些砖瓦从汉代到清代中晚期都有,用在博物馆的墙面上,更能体现出这是个收藏历史记忆的地方。

其实,王澍瓦片墙的想法早已存在于他的头脑中和图纸上。然而,若非宁波博物馆给了他机会,这些美妙的想法不可能被世人所见识。王澍也正是在这一次次历练中成长起来,最终成为获得普利兹克奖的中国第一人。

记者走访了不少建筑设计师,有耄耋之年的老学者、老专家,有三四十岁的中坚力量,也有二十出头的入行新手,有句话在他们每个人那里都会听到——对中国设计师多些信心。

“全世界一半以上新建的工程都在中国,可以说,全球建筑师都来中国做事了。外国设计师有先进的技术、丰富的经验和细致的分工,也有好的设计理念,这是他们的优势。国内设计师聪明、勤奋,构思和理念也不差。同时,他们对中国文化和国情的理解则更透彻更到位。”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建筑设计大师何镜堂充满信心。

建筑是一门综合艺术,本土建筑设计师的崛起,不可能仅仅靠个人努力就能够实现。在中国各地建设最活跃的年代里,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为外国设计师提供“试验场”,而没能培养出具备国际水准的本土建筑设计师,那将是建筑行业的遗憾,乃至整个国家的悲哀。

那些真心想打造地标的人们,不妨多给本土设计师一点信心、一些机会。相信不久的将来,中国设计师会向世界交出一批出类拔萃的“中国式”地标!

《周末》执行主编 姜 范

编辑 张济和 何东宪

教 蓉 李 丹

邮 箱 jrbzmzk@163.com